

论民国时期外国驻华记者与中国记者的合作与竞争

路鹏程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民国时期的中外记者在新闻专业层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协同采写新闻报道、共同抗争新闻审查、合力创办新闻教育、互助共建新闻职业团体, 但是当他们在关涉国家民族利益的新闻议题上发生分歧和矛盾时, 中外记者则都会强调民族主义至上, 并就此展开尖锐的争论和激烈的博弈。中外记者的合作与竞争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出, 中国报业在融入全球新闻传播过程中艰难地协调着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新闻业是英美报业西风东渐的产物。中国知识分子在揖美追欧, 求索民族启蒙和国家救亡的道路中, 开始瞩目西方新闻业, 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记者, 并且在与西方报界的学习交流中不断推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进步。恰如民国新闻学者所指出, 中国的新闻事业主要是以英、美、日为师(黄天鹏, 1930: 101)。然而, “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毛泽东, 1991: 1469), 这导致中西师生关系颇为微妙, “一方面尊师的风气仍在成长, 另一方面反西的情绪也在发展”(罗志田, 1999)。师生之间既融洽, 又紧张, 既合作, 又竞争, 既相互欣赏, 有时又彼此敌视, 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极为复杂, 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新闻业在融入全球新闻传播过程中, 艰难地协调专业主义、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以建构和发展既符合国际原则又切合本土国情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

本文主要探讨中外新闻记者在工作实践中如何进行合作、展开竞争, 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中国记者如何协调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需指出的

【作者简介】路鹏程,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研究(1911—1937)——基于工作社会学的视角”(16YJC860012)。

是，其一，本文所讨论的外国驻华记者主要是英、美、日三国的驻华记者。此三国不仅驻华记者人数最多，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而且英、美、日在政治军事等层面与华交涉最密切，也是对华影响最大的国家。其二，本文所说的外国驻华记者，既包括国际新闻机构驻华的外国新闻记者，也包括西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新闻媒体中所聘用的外籍新闻记者。因为，西方新闻媒体驻华记者经常从外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上获取新闻，并且外人在华报刊记者又经常兼任西方新闻机构驻华记者，两者的互动合作极为密切，交往流动极为频繁，形成具有共同特质的诠释社群（赵敏恒，2011：5）。其三，本文主要以民国前中期为研究时限。因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外媒体与记者均因战争的深刻影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和特征，本文囿于篇幅，对此暂且不论。

此外，既往研究常将新闻专业主义限制在单个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考察其建构发展的历程，或者将新闻专业主义视为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的传播与移植，而本文将展示中外记者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形态与特征；其次，以往研究在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时，常将其置于某段战争时期或某个热点时刻来考察其紧张与冲突，而本文试图将其放在战时与平时、热点时刻与日常社会交织而成的全面的、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来检视其错综复杂的张弛嬗变。

一、同构新闻图景与共塑专业标准：中外记者的合作

（一）合力采写报道新闻：“他对我的帮助，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这些外国记者孤身一人，远涉重洋，来到人地两疏的中国，无论是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憧憬的“中国迷”，还是后来名扬世界的“中国通”，初来乍到时，对中国都所知无几。正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鲍威尔（John B. Powell）所说，他来华之前“对于远在天边的中国……的全部了解，只是从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很少几页的文字和并不正确的地图上获得的。”（约翰·本杰明·鲍威尔，2008：2）1928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刚到上海时也坦承，“对中国一无所知啊”（埃德加·斯诺，1984：2）。这些记者开展采写工作时首要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消息来源匮乏（*The China Press*, 1936a）。除了依靠外国驻华军政官员、教会人士、新闻同业，以及在口岸城市深居简出的少数同胞之外，他们主要依靠中国记者的协助来建构通达广袤内陆、覆盖社会各层的新闻网。如1920年来华任《大陆报》记者的爱宝莲（Edna Lee Booker），在上海外人社交圈中刺探消息游刃有余，但若独立采访“中国本土事务”则寸步难行，总是由她的中国同事，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李先生（Lee）作陪翻译（宝爱莲，2015：16）。而1926年首次踏入中国的阿班（Hallett Abend）追忆说，“回首我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由于语言不通，不时置身险境，再加上日复一日的极端

恶劣条件，一切都显得眼花缭乱”，让人极为不堪。幸亏得到《广州英文日报》李才的鼎力协助，疏通关系，联系政要，阿班方才得以顺利完成采访报道任务。阿班对此感激不已地说：“他对我的帮助，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哈雷特·阿班，2008：14、27）

外国驻华记者的主要任务是报道政治新闻，尽管有些记者驻华日久，中文日熟，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但是由于民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政之/胡政之，2007：288）。即使中国报人观之有时亦如坠五里云雾。恰如邵飘萍所指出：“凡政治无轨道之国家，事件之发展，每不可以常理预测。故为我国之外交记者则难而又难。”（邵飘萍，2008：52）外国驻华记者在观察和解读中国政局时更是难上加难。担任过多家外国媒体驻华记者的端纳（W. D. Donald）就对此充满困惑和抱怨，“中国的政治似乎复杂离奇，好像一团乱麻”（端纳，2013：5）。因此，外国驻华记者们积极寻求中国同业的合作，以帮助他们分析中国政府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和风云变幻的军政动态。1932年担任日本联合社上海支局局长的松本重治就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个日本记者，对中国军政形势的理解非常有限。因此，在判断小道消息的真伪、评判新闻的重要与否以及预测时局态势动向的时候，中国专家的意见便显得至关重要。所以，除民国政要和社会名流之外，松本重治积极结纳萧同兹、程沧波、陈博生、董显光等著名记者和报人。他与曾经留学日本的张季鸾、胡政之更是交往甚密，并对他们两人的热忱相助十分感激：“我每次有事拜见张、胡两位时，他们总能抽出时间来。两人的意见都具建设性。”（松本重治，2005：1、65、79）不独松本如此，赵敏恒当时还观察到，“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在南京的日本记者都得雇用中国记者为其收集最新的政府动向”（赵敏恒，2011：34）。因此，许多外文娴熟的中国记者成为外国驻华记者争相结识的合作伙伴，甚至其中有些人在外国驻华记者圈子里比在中国新闻同业中名气大很多。如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编辑的张似旭（Samuel H. Chang），中英文俱佳，在外国新闻记者圈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鲍威尔说：“原因是他经常有许多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闻提供。”（约翰·本杰明·鲍威尔，2008：324）而提到“浑身是消息”的赵敏恒，许多英美著名记者都翘起大拇指（肖沱，1997）。

但是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的驻华记者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和特权，自由地游走在中外政要显贵之间，常能探听到中国记者无缘与闻的重大政治内幕。先后任路透社、《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驻华记者或负责人二十多年的伍海德（H. G. Woodhead）傲慢地指出，“外国记者的主要职责是获得有关贷款谈判和外交动向的新闻——这些在当时中国记者是无法获悉的”（伍海德，2013：32）。甚至不少外国驻华记者涉入中国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政客顾问或军阀幕僚，常常预闻最高政治机密。如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端纳、密勒（Thomas F. Millard）、辛普森（Clare Lenox

Simpson)、李亚(George Bronson Rea)、小谷节夫等都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南京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军阀的政治顾问(赵敏恒, 2011: 62; Rozanski, 1974: 191; Volz & Lee, 2011; 宝爱莲, 2015)。^[1]此外,也有一些中国政要崖岸自高,对中国记者不屑一顾,只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金雄白, 1988: 211)。所以,民国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新闻当时都是首先刊发在欧美媒体之上。因此,中国记者需要常常积极主动地结交外国新闻记者,以扩大新闻线索,特别是那些不易访得的政情内幕。由于中外报刊的目标市场不同,没有直接的商业竞争和利益冲突,外国驻华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也乐于与中国同业,尤其是与知名大报记者分享消息或合作采访。《新闻报》的顾执中跟《字林西报》的记者在新闻线索方面经常合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脱漏重要新闻,而且还能获得独家新闻,使《新闻报》在上海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常胜人一筹(顾执中, 1985: 36)。而当时《立报》的年轻记者舒宗侨在采访之中,为保持有充足的新闻来源,和外国驻华记者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正如他回忆说:“我每晚要和外国报纸、通讯社交换新闻,看看有无遗漏。特别是英文《大陆报》《大美晚报》,我每天下午、晚上都要通电话。”(舒宗侨, 1987)

特别是当重大新闻事件爆发之际,事实真相隐晦难明,事态走势变幻莫测,中外记者都需探知对方国家的政府反应和舆论动向,以厘清真相,把握走势。为此,双方都会积极主动地交换消息,合作采访,共寻真相。西安事变时,《西安日报》的张兆麟协助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千方百计避开蒋系军队的重重包围进入西安进行采访。同时张兆麟也需要外国记者设法帮助他们突破南京政府的新闻封锁,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声音以及事变的真相及时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尤其是当时国内外舆论界谣言四播并且充满对张、杨以及事变的污蔑。贝特兰和史沫特莱等当时身处西安的外国驻华记者利用广播电台,使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将事变前后发生的重要新闻传向中国和世界(詹姆斯·贝特兰, 1993: 18-19)。

再则,在报道某些揭露性、批评性新闻议题,希望引发中国民众普遍关注,形成广泛社会动员之时,外国驻华记者有时感到身单力孤,孤掌难鸣,也需要中国媒体的积极协作。如伍海德在中国记者的配合下成功地阻止了意大利商人非法向中国军阀出售武器的交易(伍海德, 2013: 85-87)。

而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记者既熟悉外国文化脉络,又谙熟国际新闻规范,因此他们与外国驻华记者交流更密切,合作更为深入。其中不少佼佼者,赢得西方报人的认可和尊敬,甚至成为外人在华新闻事业的负责人,领导外国驻华记者开展新闻工作。如曾任路透社南京分社主任的赵敏恒,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际通讯社驻华分支机构主管的中国记者。有时这些中国报人领导的西方在华媒体,因汇聚东西精英,文化相因相进,比外人管理经营的在华媒体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如董显光主政《大陆报》(1929—1935年)

时期，领导一群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中美年轻记者埋头苦干奋力拼搏，把报纸办得风生水起，一时使同城竞争对手、历史悠久的英资报纸《字林西报》相形见绌（董显光，2014：93-98）。

中外记者通过相互假借、嵌入到彼此的知识结构、关系网络和实践工作中来增强自己的新闻采写能力，藉此将自己的新闻知识、采访网络拓展到各自原本无法触及，或不易涉入的社会空间之中，有力地提升了中外记者新闻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而在合作采写的过程中，中国记者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记者的现代采写技能等显性新闻知识和经验，以及一种无远弗届的世界性新闻知识与经验（默顿，转引自钱进，2015：14-16），西方记者侧重于观察和领悟中国记者在采访中如何处理人情世故等默会新闻知识与经验，以及中国特有的地区性新闻知识与社会经验。中外新闻记者的这种合作，丰富和增强了彼此在新闻专业主义技能和知识层面的认识和实践，构成了国际合作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奋力共抗新闻审查：“我一定尽我底一份帮助之力。”

尽管在治外法权和列强政府蛮横态度的保护之下，外国驻华记者享有广泛的自由权利，但是他们感到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麻烦依然是新闻审查（*The China Press*, 1936a），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未能摆脱西方列强的牵制和欺凌，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于国际社会，但是当外国媒体和记者触犯军阀政客的切身利益时，他们都会千方百计予以威慑惩戒（伍海德，2013：145-147）。特别是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标举民族主义旗帜和厉行新闻统制政策，曾一度对外国新闻媒体和驻华记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倘若它们触犯政治敏感问题，亦不惜代价将其报刊禁邮禁售，或将其记者驱逐出境。辛普森因为在北京经营《远东时报》（*Far Eastern Times*）支持张作霖，南京政府强烈要求将辛氏驱逐出境。1929年，《字林西报》驻北京记者甘露德（Rodney Yonkers Gilbert）因报道吴佩孚进驻北京消息失实而引发南京政府对该报实施禁邮。此外，英资的《京津泰晤士报》、日资的《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等都遭到过南京政府制裁（赵敏恒，2011：37、45；伍海德，2013：159-167；兰德，2001：169-170；于泓洋，2018：26-29；Rozanski, 1974：186-187；Volz & Lee, 2011）。田伯烈（H. J. Timperley）说在1933年驻华记者每三篇新闻稿中能有一篇通过国民政府审查发向海外就算非常幸运了（*The China Press*, 1936a）。而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记者的著作也被南京政府列为禁书。故此，伍海德指斥国民党对外国记者媒体的查禁“偏执和不负责任”（伍海德，2013：161）。如果说伍氏代表了右翼外国驻华记者的偏见，那么，1929年美资《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因撷拾里巷流言报道“中国政局谣言”遭到南京政府禁邮处罚时，“引起在华英字报（连日本人主办之英文报在内）一致之抗议”（大公报，1929a），则显示出外国记者对南京政府严厉的新闻审查

制度的普遍反感。

当外国驻华记者遇到国民政府不合理、不公正的新闻审查和惩处时，中国记者都会予以道义上的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1929年4月25日，《纽约时报》因报道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批评，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驱除《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并且下令各级政府官员均不得接见阿班，禁止政府人员向其提供消息。在新闻工作中一时陷入困境的阿班，得到了中国记者暗地表达的“同情态度”（哈雷特·阿班，2008：86、97、101；*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930；*The Shanghai Times*, 1930；*The China Press*, 1931）。而同年《华北明星报》禁邮事件发生时，同处津城的《大公报》仗义直言，认为该报“受此过重之罚，殊觉代为抱憾”，呼吁南京政府对此应“时时纠正其不正确之谣言，不可放任”，但也“不必严惩”（大公报，1929a）。

尽管外国驻华记者在触犯中国军政权势人物和重大利益时也会遭到种种制约、限制和查禁，但如前所述他们依然享有中国记者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广泛的自由权利；另则，外国驻华记者和媒体不受国民党的事先新闻审查，虽然事后也会受到惩处，但新闻已经传播出去，消息广为人知，记者已经实现其工作目标（*The China Press*, 1933；*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5a）。所以，中国记者积极寻求外国驻华记者的帮助，以突破政府的新闻审查。而且外国记者，特别是英美记者拥有强烈的新闻自由传统和意识，如密勒、斯诺等人对新闻自由的热爱即使在英美社区也是超出群伦，名著一时（French, 2006：30；约翰·汉密尔顿，1990：73）。他们极为反感新闻审查，认为中国新闻发展遭遇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客军阀所滥肆的政治高压和新闻审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28），所以，他们深切同情中国记者，热切地帮助中国记者抵制新闻审查。

如顾执中自述，当他有时遇到因政府查禁无法报道的新闻时，他就用电话联系所熟悉的外国记者，如鲍威尔和《字林西报》的格林（O. M. Green），由他们去采访消息（顾执中，1986：62；顾执中，1985：313）。当斯诺得知萧乾所写的冯玉祥访问记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砍得面目全非，冯氏的抗日主张全部被删掉之后，斯诺立即请萧乾介绍他去采访冯玉祥，并将其抗日主张公开发表（萧乾，2011：23）。而来华有年、担任过《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多家报刊记者的克劳（Carl Crow），曾受邀担任天津《庸报》董事会主席。他从未出席过董事会议，也从未到过报社，甚至与报纸管理层亦联系不多，然而，每当《庸报》遭到政府新闻审查的威胁和刁难时，克劳就会挺身而出予以保护。不像许多外国冒险家为捞取外快而为中国报纸提供治外法权的庇护，克劳“从未拿过一分钱薪水”，他这么做纯粹是出于新闻记者为追求和维护新闻自由的共同道义。克劳称，先后向他寻求帮助的中国报纸有6家之多（保罗·法兰奇，2011：

145)。斯诺致平津新闻学会成立的贺信，即表达了许多外国驻华记者积极协助中国记者通力反抗新闻审查的共同心声，“在（新闻——引者注）检查问题这一点，以及普通采访方面，中外记者既然利害相同，我们相信将来会产生一种密切的合作，在我们之间。这里，我愿意提出，假如贵会将来有什么实际的提议时，我一定尽我底一份帮助之力”（转引自贺逸文，1981）。

此外，外国驻华记者除了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评中国新闻审查制度的新闻和言论，他们还在西文报纸上翻译转载《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中国主流媒体批评国民政府新闻审查制度的文章，支持中国媒体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The China Press*, 1935a, 1936b, 1935b, 1919;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5b）。此外，斯诺、田伯烈、伍海德、阿班等还在海外发表出版的文章和著作中批评南京政府对新闻自由空前严酷的镇压。外国驻华记者希望藉此来争取国际社会施压中国政府，迫使其减缓对中国记者以及外国驻华记者的审查和束缚。

外国驻华记者，特别是中国本土记者，单独直面民国政府细密严苛的新闻审查之时，都较为脆弱，任何冲击文网的举动均是代价沉重，且功效不著。由于民国政府惩处中外记者的缘由不同、方式有别、情景殊分，当它查禁其中一方时，被惩戒者总能得到另一方的奥援，所以新闻审查存在的这种错位空间和缝隙地带，使得中外记者通过紧密合作、互通有无，就能机智而策略性地突破了民国政府的新闻审查，将其严厉查禁的新闻传遍中外。这种合作拓展了中外记者新闻自由的活动空间，鼓舞和坚定了他们——特别是中国新闻记者——追求新闻自由的信念。而这是国际合作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又一个典型特征。

（三）协同创办新闻教育事业：“将美国的新闻原则介绍到那里去。”

民国知名报人褚玉坤指出，“中国的报业固然走着英美路线，就是中国的新闻教育，也走着英美路线”（褚玉坤，1947：4-5）。当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威廉院长（Walter Williams），“这位新闻专业主义运动的先锋和致力于向东亚和世界推广美国新闻学理念的领袖”，以满怀传教士般的热情来华推广新闻高等教育时，立刻获得中国各界的热烈欢迎，并且随后获得巨大的成功（Tong, 1931; Weston, 2010; Volz & Lee, 2011）。许多外国驻华记者，其中不少都是威廉的学生，也积极投身到中国新闻教育建设发展之中。

这些驻华记者纷纷走进新闻院校，亲自向年轻的中国新闻学子们传授新闻采写技巧和修养。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帕特森（Donald Patterson）协助卜舛济创办了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密勒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同时，帕特森还热情洋溢地到上海各个大学以及各类社团去宣讲现代新闻学知识、原理和职业道德（*The North-China Herald*, 1921; 申报, 1922a）。继帕特森主持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武道（Maurice

Votaw），同时也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字林西报》的特约记者。在北京，时任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斯诺、英国《卫报》兼路透社驻华记者的田伯烈加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担任兼职讲师。其中，斯诺执教近三年，开过《新闻特写》《旅行通讯》等课程，指导过《平西报》《燕京新闻》等学生实习报纸，还积极参加新闻系讨论周和燕大新闻学会的各项活动。即使是国人创办的新闻院系和高等院校开设的新闻学课程中也不乏外国驻华记者的身影。如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聘请日本记者奥宫正澄讲授日语（顾执中，1985：148）。北京《导报》主笔柯乐文（Grover Clark）在北京大学开设“报纸练习”课程，供“有志新闻事业者”学习（北京大学日刊，1923，转引自周婷婷，2013：101）。

这些驻华记者从学校得到的薪水极为微薄（埃德加·斯诺，1984：154），他们大多是抱着传道育人的热情和责任走上新闻讲台，并且他们强烈的新闻道德、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出色的新闻写作技能，深获学子们的钦羨和敬重。当时在燕大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就感到非常幸运，能在斯诺的指导下写小说，译文稿，度过大学的最后两年，收获丰厚。1935年毕业之际，斯诺还送给他鼓鼓囊囊的一皮箱英文书，萧乾欣喜地拥有了他“生平头一批藏书”（萧乾，2010：43）。而另一位燕大学子陈翰伯则将他和斯诺亲切地形容为：“我们是师生，又是朋友，是可以互相交心的朋友。”（陈翰伯，2000：420）在教学之外，斯诺夫妇还热忱地援助张兆麟、陈翰伯等参与组织的进步学生运动（约翰·汉密尔顿，1990：49-52）。燕大的新闻学子们知恩图报，对其老师在华的新闻工作给予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萧乾毕业进入《大公报》之后，继续与斯诺保持着合作关系。而陈翰伯则冒着巨大的风险协助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挣脱国民党的阻挠秘密赴延安采访，并为其担任部分翻译工作（陈翰伯，2000：438-444）。张兆麟帮助海伦·斯诺采访张学良，并对斯诺夫妇的好友詹姆斯·贝特兰进入西安事变后的陕西进行采访报道给予大力协助。

除了一些直接投身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外国驻华记者之外，其他外国驻华记者也密切关注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他们对中国新闻院校的建立、宗旨、特色以及各类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都给予详尽的报道（*The Shanghai Times*, 1935;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23, 1926; *The China Press*, 1928）。外国驻华记者还热情鼓励和全力支持中国记者撰写新闻著作，中外记者共同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和普及新闻知识和理念。如路透社的伊文思（P. D. Evans）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作序揄扬：“吾愿邵君此书大告成功，并望大有裨益于中国新闻事业之发展焉。”（邵飘萍，2008：9）赵敏恒甚至撰写专著《外国在华的新闻事业》，专门研究中外记者合作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并且在写作中得到许多外国驻华记者的鼎力相助。

藉此，国际合作建构新闻专业主义所展现出的另一典型特征是：外国驻华记者在新

闻院系不仅系统地训练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技能与知识，而且向他们制度化地灌输新闻专业主义背后所深刻隐含的价值和理念。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特别是具有国际新闻采写能力的记者（司徒雷登，2010：66）。这不仅极大地加强了外国驻华记者与年轻一代中国记者之间的个体合作与个人情感，而且为中国年轻一代记者走向世界进行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四）互助共建新闻职业团体：“使中外新闻从业人员密切合作，增进友谊，改善邦交。”

在中国新闻业迈向专业化的艰难跋涉之中，新闻职业协会对建构新闻业的声望和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外国驻华记者积极支持中国新闻职业协会的建设，如1936年平津新闻学会成立典礼时，田伯烈、黄思、白雅格等京津地区的外国驻华记者联名写信祝贺，斯诺还致函学会常务理事陈博生：“希望由该学会的媒介，使中外新闻从业人员密切合作，增进友谊，改善邦交。”（大美晚报，1936）此外，中国报人与外国驻华记者联合成立了多家国际新闻职业协会，如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1912年）、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1913年）、武汉国际新闻记者协会等（赵建国，2008：285；王润泽，2010：361-362；唐惠虎、朱英，2012：340）。

1919年2月15日在北京成立的万国报界俱乐部更是规模不俗，影响一时，成为“中外报界密切交往的标志”。六十余名中外新闻记者出席成立大会，辛普森、佛亚福、奇意鲁司华、利慈奇、栖崎桂园、长谷川贤、永持、渡边哲信等外国记者还积极参与了职员选举。其中辛普森当选副会长，《北华正报》社长渡边哲信当选评议员（赵建国，2008：285-288）。

万国报界俱乐部以“促进中外报界同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与意见，共图报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盛京日报，1919；申报，1919）。首先，为便于中外记者沟通交流，俱乐部成立伊始便决定聘任翻译人才，处理中英文稿件。其次，致力于创办图书馆购储中外图书以供报人查阅，至1920年俱乐部阅览室已有各类报章杂志逾百种。再次，注重联络中外政要及社会名流以扩大报界影响，俱乐部多次邀请各国驻华使节、中国政府高官参加会议，相与联欢。又次，积极维护报业合法权利。如1919年5月天津《益世报》被禁，俱乐部致书总统和国务院要求释放报社记者，并强烈批评政府的言禁政策，“如此钳制报纸，实与进步思想不符”，呼吁国务院“采用英美法意等国之自由法规订成报纸专律”（民国日报，1919）。

即使中国记者职业团体组织也强调积极联系外国驻华记者，交流切磋，互助互进。平津新闻学会“定期举办茶会，邀请外籍记者出席，交换消息、意见或讲演，以资联络”（贺逸文，1981）。《密勒氏评论报》的帕特森、密勒、鲍威尔，《大陆报》甸益尔等外国驻华记者经常受邀赴上海记者联欢会讲演世界新闻事业之状况，讨论中国新闻事业之

前途，规划中国新闻教育之发展，探索中外新闻记者之合作等等（申报，1922b，1922c，1924）。外国驻华记者也热情邀请中国记者，加强联谊和合作（*The China Press*，1921a），同时他们还积极关注、报道中国各地新闻记者和新闻职业团体的各项活动，大力支持他们为提升职业地位、维护职业荣誉、争取新闻自由而开展的各项运动（*The China Press*，1930；*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36；*The China Press*，1935c）。

如果说前述三节中的中外记者合作仅限于为数不多的中外精英记者个体之间，即外国驻华记者中那些热心深入中国社会，醉心探究中国问题的“中国通”，和中国记者中那些曾就读国内外一流学府的知名记者，那么中外记者共建新闻职业团体使中外记者间原本个人化、零星式、松散性的，或仅局限在狭小范围内的合作得以制度化、组织化、常规化的方式将合作范围拓展到更广阔、更多元的记者群体之中。中外记者积极组织国际记者职业团体，外国记者热衷参加、关注、报道中国记者职业团体的活动，这都证明中外记者具有广泛的、共同的职业诉求和专业利益，并且通过职业团体的组织形式来寻求群体性的理解、信任和合作，以实现、维护和增进其职业诉求和专业利益。

概而言之，中外记者在新闻采写实践（专业知能）、高等教育（专业训练）、新闻自由（专业自主）、职业协会（专业组织）等新闻专业主义的四个核心面向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并取得了丰硕而深厚的成果，有利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二、自利性的国族诉求与选择性的职业标准：中外记者的竞争

（一）新闻真相的分歧与争论：“若偌大中国，无一好消息，足以报告者。”

外国记者大多是透过国际贸易、殖民主义和帝国霸权这样一个三棱镜来观察和报道中国（保罗·法兰奇，2011：111），换言之，他们报道中国新闻的根本立场和终极目的是维护本国现实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在涉及国族权益冲突的具体问题和事件之中，中外记者难免存在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博弈。如伍海德坚定拥护治外法权，声称他在华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中，写得最多，维护最力的就是治外法权问题（伍海德，2013：130）。而邵飘萍则始终不断抗争，大声疾呼“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唤醒民众，“永久认定最后之目标，合我国而为大规模之运动。须知不共戴天之仇，亡国灭种之敌，即此不平等的条约是也”。并且每当遇到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权利和国土事件发生时，如关税修订、万县惨案、五卅惨案等等，更会激发邵飘萍的强烈诉求，坚决揭露和驳斥某些外国记者和媒体“不惜牺牲自身之人格与价值，竭力为租界外人担任造谣污蔑之工作”（邵飘萍，1998：139-143、136-138、144-145、148-151、192-193、207-208）。

围绕这些具体纷争，常常会在情绪上激化为深刻的敌意，在认知上泛化为中外记者

之间普遍的对立。如《申报》副主编王伯衡1927年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批评：“欧美各大报之驻华通信员，所发寄至各该国登载之消息，非土匪作乱之事实，即强徒劫杀之记载。若偌大中国，无一好消息，足以报告者。”（王伯衡，1930）这篇文章1930年又被收录在民国著名新闻学者黄天鹏编著的《新闻学刊全集》之中，可见它得到报人与精英知识群体的广泛认同和高度共鸣。在《新闻学刊全集》之中，黄天鹏也发表文章，控诉外国通讯社涉华报道的三大罪状：“制造谣言”“颠倒是非”“暗中挑拨”，这在中国国内“挑拨政潮”，在国际上致使“欧美民众，每误认中国为半开化民族，及种种误解与藐视”（黄梁梦，1930：113-117）。而伍海德抨击中国记者与媒体说：“在所报道的事件中大部分是非专业、不可靠的；通常他们的社论甚至不能给15岁大的欧洲或美国孩子留下印象。”（伍海德，2013：197）日本联合社的岩永裕吉也宣称，“中国的谣言是世界有名的”，日本媒体的责任是去“戳穿它”（松本重治，2005：46）。这些中外记者的言论都没有针对具体对象或特定问题，均是对彼此新闻报道的整体状况和一般情形的概括总结，这愈益充分地显示出中外记者之间在心底存在着普遍的对立和深刻的矛盾。

但恰如西方当代研究者所指出，民国时期的外国驻华记者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对华态度和情感也差异很大，特别是20年代以后，在华记者队伍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多元化（保罗·法兰奇，2011：131、160）。中国记者当时也认识到这点，他们针对外国驻华记者新闻报道失实的原因做出了质的区分，并采取了不同的因应方针和策略（郭恩强，2013：102）。对因为文化隔阂和技术操作失误而引起的失实报道，中国记者能够予以充分地谅解。如《大公报》指出：“外国人采访别国新闻，根本上本自不易。况中国时局之突兀诡幻，虽本国报界尚且常感于无术判断，是以报告错误，决不足异。”（大公报，1930）他们呼吁中外记者加强联络，希望外国媒体记者能够恪守新闻专业准则，客观地看待中国存在的问题，公正地报道中国取得的成绩（转引自张咏，2013）。但对于充满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在新闻报道中恶意歪曲、丑化、诋毁中国的外国驻华记者，中国记者则奋起反击，绝不宽宥。首先，他们纷纷在中英文报纸上撰文揭露和反击那些外国记者的恶意报道和侵略野心。其次，他们一再呼吁和敦促中国政府设立完善涉外新闻管理政策和法规，依法处罚外国媒体记者践踏中国主权的不法行径（张季鸾，2011：347）。对于某些坚持极端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立场，肆意诋毁中国的外国驻华记者，中国记者要求政府严惩不贷。如王伯衡称甘露德，“其思想几全为帝国主义所束缚，故其所发之议论，十九皆不利于中国”；而他斥责伍海德更是“生性仇华，其每日报上之评论，莫不如疯犬之骂人……在蠢虫目中观之，中国之事，全属无希望，中国之人，全系无智识”。王伯衡甚至认为，中国民众近年发起反英运动，“二人侵略中国之文字，实为罪魁中之罪魁也”。王伯衡强烈要求政府对他们进

行严厉惩治，驱除出境（王伯衡，1930）。再次，为了让国际报界广泛获知不法外媒记者的不端职业行为，中国记者充分利用国际新闻会议，致力揭露外国驻华记者对中国的失实报道和歪曲评论。如在1921年世界报业公会会上，董显光、黄宪昭、许建屏、王伯衡等中国与会记者都先后批评了外国驻华记者和西方媒体针对中国虚造之记载及诋毁之议论，建议西方媒体负起新闻道德责任，严肃中国报道（Weston, 2010；张咏，2013）。当一些中国记者获得外报的管理权力之后，竭力扫除外报长期以来形成的排华意识，换以客观性眼光，建设性立场来报道中国新闻。如当董显光主持《大陆报》后，新闻言论悉以中国利益为本位，报纸版面为之一新。中国记者盛赞其“有许多显著的进步”，“一洗外报捕风捉影和隔靴搔痒的弊病”，“颇能表示主张公道的精神”（胡道静，1986：373-374）。此外，中国记者还奋力自主兴办外文报纸与外国舆论相抗衡，反击国外反华新闻言论，积极营造利华的国际舆论环境。特别是针对日本在华媒体记者“每摭拾流言，肆意宣传，均不利于中国”（大公报，1929b）的情况，1915年12月，中国记者孙明允、廖肖函创办《东华评论》旬刊，力图与日本舆论势力相抗衡，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排日色彩（周佳荣，2012：138）。

（二）专业理念的落差与冲突：“大有负新闻家之责任。”

在民国前期，中国报业发展迟缓，新闻职业化程度较低，记者群体鱼龙混杂，言论报道、职业道德亦良莠不齐，光怪陆离。这引起西方记者的广泛批评（*The China Press*, 1932；*The North-China Daily Press*, 1925）：许多报纸收受贿赂，惟利是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完全沦为军阀政客私人宣传之喉舌（*The North-China Daily Press*, 1929）；低俗小报，诲淫诲盗，伤风败俗，泛滥无度（*The North-China Daily Press*, 1928）；报馆新闻观念陈腐、生产设备陈旧、工作节奏缓慢，新闻记者收入菲薄以致不能称之为一个受薪的职业（*The North-China Herald*, 1914）。中国报界这些内在的积弊有时导致中外记者之间的合作始则期许颇高，继则摩擦迭出，终至彻底破裂。其典型，如万国报界俱乐部事件。本为密切中外报界交往而成立的万国报界俱乐部，因其接受政府津贴，遭致外国驻华记者的反感，担任俱乐部职员为数名美国记者，尤为不满，愤而辞职，不再参与会务。1921年1月，在部分中国记者的操纵下，俱乐部摒除外国记者，私下讨论章程修改和会员规范问题，严重违背会章。至此，该组织名存实亡，后则无形中辍（晨报，1920a，1920b）。

尽管民国初期许多中国记者的所作所为确实不符合新闻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但也并不是所有外国驻华记者都遵守新闻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龚德柏指出，曾任万国报界俱乐部副会长的辛普森热衷参与军阀政争，先后接受张作霖、阎锡山的津贴，帮助奉系、晋系军阀宣传（龚德柏，1989：100-103）。胡政之批评，“日方通信机关供给，关于东省之事，固是无一字一句不含挑拨搅乱之恶意，其所传南北各方消息亦决

不正确”（冷观/胡政之，2007：927）。甚至有些外国记者的采访方法和工作态度达不到新闻专业的起码要求。如赵效沂揭露，日本电通社驻北京记者横田实，常不劳而获，依靠抄袭中国报纸来报道新闻（赵效沂，1981：7）。《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佛来色（David Praser），“不喜动，好古玩，每日看守家门，鲜有外出，晨间厨役买菜回来，必询问外间有何新闻”，然后参阅当日报纸，草成消息，寄发伦敦（王伯衡，1930）。王伯衡的嘲讽，虽过于戏谑，但揆诸实际，不乏其徒（伍海德，2013：28；大公报，1929a；冷观/胡政之，2007：925）。如《大公报》就发表社论警告这种外国记者，“不可专倚赖自身所用之翻译、西崽、厨夫、阿妈为研究中国之对象”（大公报，1929a）。即使外国驻华记者中的开明人士也承认这些问题。伊罗生就对其外国同业的整体水准评价不高，认为他们是“一群根本没有聪明才智的、我一直视为‘新闻爱好者’的平庸之辈”（彼得·兰德，2001：96）。而克劳则发现许多美国来华的同行“没有任何明显的谋生手段”，缺乏起码的新闻知识，有的人甚至在走私毒品（卡尔·克劳，2011：58、66）。阿班则亲眼目睹，很多记者声称从前线枪林弹雨中发出的新闻报道，其实都是他们周旋在酒吧舞厅，于花天酒地之中，道听途说、东拼西凑而成的（Hallett Abend，1944：163）。

此外，还有中国记者对英美式的新闻教育，特别是外国驻华记者参与颇力、参与较深的教会大学新闻院系提出质疑，“燕大新闻系，到现在，已有廿余年的历史，人才辈出，大半在英文报馆内工作”。有记者批评则说：“这是造了高等新闻人才，反为在华的外国报馆添些帮手，而中国报馆仍是得不到什么好处。”（褚玉坤，1947：4-5；郭步陶，1935：7-9）甚至还有记者认为，教会新闻院校“灌输多量的宗教意识，准备将来对于中华民族作一种反宣传。这种含有宗教侵略式的新闻教育，直截的说，在我们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看来是极端地不需要，而且无论它有怎样的卓绩，总说为我国办学者一种绝大的耻辱”（申报，1930）。话锋一转，这些记者们盛赞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等中国新闻院校，“对于民族主义运动均有所景仰，为此努力已有相当卓绩”（申报，1930）。

1920年代晚期以后，随着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加速发展，一批著名记者和报纸在社会上树立起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标杆之后，外国驻华记者的专业失范行为和非法行径成为中外记者摩擦和冲突的重要缘由。中国新兴精英记者和严肃报纸纷纷批评外国驻华记者“抱有闻必录之旧观念，摭拾其身边不利谣言，任便为肯定之报告，……大有负新闻家之责任”（大公报，1929b），“殊失大新闻之态度”（邵飘萍，1998：30-31）。特别是从美、日留学归来，熟悉西方文化精神和国际报业状态的中国新闻记者如邵飘萍、胡政之、王伯衡、赵敏恒、黄天鹏等，对外国驻华记者失范行为和非法行径关注最切，研究最多，批评亦最强烈。

三、民族主义与专业主义：冲突与合谋

恰如前文所述，中外记者竞争合作的具体原因千端万绪，但在这扑朔迷离的表象背后隐含着两个深刻而坚实的思想预设：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当然，这两者都是颇为深奥且众说纷纭的理论、思想、意识形态，甚至还是运动和话语体系。本文主要从中外记者竞争合作的视角来透析中外记者如何理解、诠释和把握专业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合谋。

1920—1930年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思潮开始蔚然成风，而与此同时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国难迭兴和国土日丧的强烈刺激下风起云涌。外国驻华记者也敏锐地感受到这股风潮，并强烈地预感到这个古老的国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恰如海伦·斯诺所说：“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即白人时代在东方到处都正在逝去，……这是一个新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Snow, 1984: 69）时代的风云际会使中国近代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股思潮错综复杂地紧密交织在一起。

如何处理这两种思潮的关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在当时中外新闻界都广为流传、被奉为圭臬且被誉为“关于全球新闻记者职业原则、职业价值和职业标准最清晰的论述”的《新闻记者信条》中提出一种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吾信明思明论，正确与公正（accuracy and fairness），为优美报学之基础。……吾信报业成功最佳及最应成功者，……既极爱本国（profoundly patriotic），而又诚诚恳恳增世界美感，培养国际友谊（promoting international good will and cementing world-comradeship）。”（*The China Press*, 1921b; 邓绍根, 2015）威廉指出，发扬新闻专业主义是报人立命之基石，激扬民族主义是报业追求之鹄的。新闻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不分轩輊，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记者身份认同的核心理念。这恰如邵飘萍所呼吁的，“愿新闻记者能不拘泥国界而为人类主持公道与辨别是非”（邵飘萍, 1998: 207-208）。国人也认为，“人谓谋全人类福利之事业有二：一为战争时参加救伤之红十字会，一则沟通人类智识之新闻”，新闻记者“负有为人类服务之使命”（胡庶华, 2010: 47）。威氏的理念与中国记者的愿望，诚为高远，但按诸新闻实践却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表现极为错综复杂。

在日常报道中，在相互合作时，在学习交流时，在向国民政府争取新闻自由和职业利益时，在倡导和传播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时，中外记者都强调源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如张季鸾指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中国报业是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年已具有相当规模”（张季鸾, 2011: 363）。西方报人不仅积极向中国传播其专业原则、职业价值和业务标准，而且也欣喜地认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和实践与日俱进，成果斐然。如1930年代初，美国报人自豪地宣称，中国主流报纸都已经美国化了。它们不仅采用美国印刷机，而且追随美式报道规范和编辑风格，甚

至办公室的装修风格都是仿照纽约报馆的样式（张咏、李金铨，2008：281-309）。所以，在日常新闻实践中，中国记者与外国驻华记者都会悬置民族主义，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相扶相助，密切合作。甚至，中国记者相信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能够推动国内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发展，而这又能进一步深化社会民众的民族主义认同。一些西方驻华记者也认为，在华宣导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涉华报道时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以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步伐，有利于维护西方在华的长远利益（Hamilton, 1986；张咏、李金铨，2008：281-309）。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山河破碎，国族陵夷，中国记者的民族主义意识既异常敏感又十分强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腥屠戮和惨重伤亡的巨大心理阴影刺激下，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也陡然高涨，为维护其国家权益，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命、财产和权利（艾瑞克·霍布斯鲍姆，2014：32），因此，当围绕关涉国家利益或民族情感的新闻议题发生分歧和矛盾时，中外记者都会强调民族主义至上。他们虽不公然否定但都刻意淡化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一切新闻实践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正如张季鸾所说：“近代报纸本有国民外交之意义，以拥护国家利益为其主要使命。”（张季鸾，2011：349）《时事新报》薛农山更是坚决主张：“在一切国际新闻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站稳脚跟，一切观察以民族利益为出发，一切是非以民族利益为归依。”（薛农山，1934：49-51）在这一时刻，国民政府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同仇敌忾，抗衡反制外国媒体报道和列强新闻政策。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集新闻记者会议呼吁，“日本资本帝国主义和各国帝国主义都有新闻政策，影响中国舆论。中国应有抵抗外人新闻政策的观念，各国用新闻政策对付我们，在此时期，新闻界应有自卫观念方法。”“我们要能相信自己，要有方针抵抗外人的新闻政策，不但为时局之需要，亦为我民族之需要。”（申报，1929）而密勒声称，他在中国办理报纸和报道新闻是“诚挚而热切地渴望促进美国利益”（Rozanski, 1974：82）。天津《星期西报》（*Tientsin Sunday News*）公开宣布在华外报的目的是“保卫外国在中华所有之政治商务利益，并抵拒华人之舆论”（胡道静，1935：69）。更不论日本驻华记者，其中很多“都是官方情报人员”，肩负收集军政情报的任务（周佳荣，2012：137）。即使一些被后世公认的具有高度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西方记者也与其国军政情报机构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合作和联系。阿班每当采集到事关重大的军政新闻“总是全力”将其抄送一份给美国驻华要员（哈雷特·阿班，2008：94、252）。斯诺在上海时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情报官每周交换信息（埃德加·斯诺，1984：26）。正如英美当代学者们所指出的，外国驻华记者与媒体“对中国的兴趣归根结底以如何让中国人、中国产品和资源服务于西方列强为目的”（保罗·法兰奇，2011：16）。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战的神话甚嚣尘上，东西各国都高度重视国际宣传，并将记者和新闻当作达国家战略目标

的最得力工具（哈罗德·拉斯韦尔，2003：36-37、147）。国际传播越来越政治化，新闻媒体逐渐从1920年代潜在的战争工具变成1930年代实际的战争机器（罗伯特·福特纳，2000：147）。在这种背景下，中外记者常常主动诉诸或被迫依附于国家力量，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一致对外。

当然，中外记者本着国家利益展开竞争时，有时也会运用新闻专业主义，但此时的新闻专业主义只是成为捍卫民族主义的一种策略或工具。具体而言：一种情况如本文前述段落所示，中外双方都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标准批评对方违反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准则，并且这种批评常常观点偏激、措词激烈，充满民族主义惯有的情绪化特征；另一种情况是，中国记者也积极通过加强新闻专业主义建设，期望取得国际新闻界的普遍承认和尊重，以便在国际新闻竞争和国族利益博弈中，赢得新闻话语权和舆论控制权，以捍卫国家利益（Shu, 2014; Wei, 2014）；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西方列强为争取本国在华利益最大化时连横合纵、纵横捭阖，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使美国驻华记者相信与中国记者展开合作，在中国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建设，反击英国、日本记者对中国的歪曲和诋毁有利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如当时美国记者围绕“二十一条”“门户开放政策”等问题驳斥日、英记者，支持中国舆论。但是，恰如英国媒体在回击中所深刻指出的，美国记者利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反英运动是为了实现其掩藏在背后的美国国家利益（Rozanski, 1974: 204-246; Volz & Lee, 2011）。

概言之，20世纪前半叶，国际形势风云激荡，民族主义，甚至常常是充满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全球高涨。对中外记者而言，新闻专业主义和民族主义似乎不是威廉所说构成其身份认同的两个基石、两种主张，而是一种主义：民族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2]即民族主义构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结构和行动逻辑，虽然在日常时刻隐而不彰，新闻专业主义有广阔的活动空间，但是一旦发生国际冲突，触痛民族情感，危及国家利益，甚或威胁媒体的商业利益，民族主义思想立刻升腾而起笼罩一切，新闻专业主义不是立即被淡化、悬置，就是被迅速收编为维护民族主义的一种工具或策略。尽管在此过程中，记者与媒体不会完全变成国家政府的宣传员与传声筒，仍然保持不同程度上的新闻自主性与独立性，但都会致力于维护民族情感和捍卫国家利益。而且对中国这样饱受列强欺凌，国势陵替日深的国家来说，新闻记者民族主义新闻专业主义色彩尤为深沉和强烈。

注释:

- [1] 除了在上述文献中,在军阀日记中也能观察到外国驻华记者与军阀的交往,如端纳、索克思、甘露德、《导报》费家禄、《泰晤士报》佛来得与江苏督军李纯、吴佩孚及其幕僚白坚武的交往,见白坚武著,杜春和,耿米金整理.白坚武日记(第一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157、221、209、210、260、269、389、411、424、433、490、364、410页。冯玉祥日记中也留下多处与上海公论社社长渡边大洋、美国某新闻记者、德国通信社访员哈记满来、《大陆报》易培根等外国记者交往的记录,见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413页(第一册),第46、84、112页(第二册)。
- [2] 西方研究者Elliot提出两个类似的概念:民族主义新闻业(nationalistic journalism),即新闻业只是传播政府想传达的和民众想听到的新闻;民族主义新闻记者(nationalistic journalist),即记者放弃独立的声音,完全服从于政府的宣传话语,按照政治权威的框架来呈现冲突性新闻(参见Elliot, D. "Terrorism, Global Journalism, and the Myth of the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1 (2004):29-45. 相关讨论亦可参见Avshalom Ginosar. "Understanding Patriotic Journalism: Culture, Ideology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30.4 (2015):289-301)。这两个概念都是强调,记者和媒体在报道战争、冲突等特殊时刻,暂时采取民族主义放弃新闻专业主义的短暂行为。它忽略了记者和媒体在战时和平时、特殊时刻和日常实践之中,在民族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徘徊转变的动态变化、状况和特征。另外,民族主义新闻业这个概念内容过于宽泛,描述过于笼统,无法解释记者在实践中的具体认知和行为;而民族主义记者这个概念则将记者界定为被动吸纳、僵化认同、刻板固守民族主义的新闻从业者,忽略了记者个人认同的主体能动性、取向多元性、形态复杂性以及历史动态性。所以,本文尝试提出民族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这样一个更富动态性和阐释力的新概念。

参考文献:

- [1]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A].载黄天鹏编.新闻学名论集[C].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993(3),第20-35页.
- [4] 赵敏恒著,王海等译.外人在华新闻事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 [5] [美]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著,尹雪曼,李宇晖,雷颐译.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威尔回忆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
- [6] [美]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复始之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 [7] "Timperley Writes on Censorship." *The China Press*. 4 June 1936a.
- [8] [美]宝爱莲著,杨植峰,俞梦恬译.民国群雄采访录——美国女记者与民国军政强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 [9] [美]哈雷特·阿班著,杨植峰译.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10] 政之/胡政之.错综复杂之时局[A].国闻周报,1926-06-13.载王瑾、胡政编.胡政之文集(上)[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 [11]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2] [澳]端纳口述,[美]泽勒撰.端纳回忆录[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3.
- [13] [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时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 [14] 肖沅.缅怀名记者、名教授赵敏恒先生[J].新闻大学,1997(2),第53-56页.
- [15] [英]伍海德著,张珂等译.我在中国的记者生涯[M].北京:线装书局,2013.
- [16]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M].台北:台湾跃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 [17] 顾执中.战斗中的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 [18] 舒宗侨.《立报》采访生活回忆[J].新闻记者,1987(3),第29-32页.
- [19] [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何大基等译.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 [20]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报人、外交家与传道者的传奇[M].台北:独立作家,2014.
- [21] 钱进.作为流动的职业共同体:驻华外国记者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 [22] [美]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 [23] 于泓洋.民国南京政府初期国民政府对外国驻华记者的管理研究(1927-1937)[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 [24] Rozanski, M.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00-192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4.
- [25] Volz, Y. Z., and Lee, C. C. "Semi-Colonialism and Journalistic Sphere of Influence." *Journalism Studies* 12.5 (2011):559-574.
- [26] 华北明星报问题[N].大公报,1929a-02-17.
- [27] "Mr. Hallett Abend Recovers Right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2 Aug. 1930.

- [28] "Mr. Hallett Abend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hanghai Times*. 20 May 1930.
- [29] "Times Statement on Abend Affair Given Out Here." *The China Press*. 20 May 1931.
- [30] "Press Censorship Delayed to Monday." *The China Press*. 2 Mar. 1933.
- [31] "Students Find New Cause to Back."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8 Dec. 1935a.
- [32] French, P. *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 The Lif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3] [美]约翰·汉密尔顿著,柯为民,萧耀先译.埃德加·斯诺传[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 [34] "Chinese Journalism."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2 Dec.1928.
- [35] 顾执中.报海杂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 [36] 萧乾.斯诺精神[A].载孙华,埃德加·斯诺向世界见证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37] [美]卡尔·克劳著,夏伯铭译.洋鬼子在中国[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 [38] [美]保罗·法兰奇著,张强译.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
- [39] 贺逸文.平津新闻学会史料[J].新闻研究资料,1981(1),第262-275页.
- [40] "Reflections on Press Censorship." *The China Press*. 6 Oct. 1935a.
- [41] "How to Improve Press Censorship." *The China Press*. 5 April 1936b.
- [42] "Suggestions to Improve Press Censorship." *The China Press*. 11 Dec. 1935b.
- [43] "A Chinese Paper on Press Censorship." *The China Press*. 8 July 1919.
- [44] "Chinese Reporters Body Send Telegram to Nank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3 Dec. 1935b.
- [45] 褚玉坤.今日之中国新闻教育[J].读书通讯,1947(138),第4-5页.
- [46] Tong, H. K. "Missouri School Wields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a Journalism." *The China Press*. 4 June 1931.
- [47] Weston, T. B. "China,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acific Affairs* 83.2 (2010):327-347.
- [48] *The North-China Herald*. 15 Oct.1921.
- [49] "Talk On Journalism Given Before 300 At Chinese Y.M.C.A." *The China Press*. 3 Nov. 1921b.
- [50] 新闻职业之演讲[N].申报,1922a-01-07.
- [51] 英文学系指导书[N].北京大学日记,1923-09-14.转引自周婷婷.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曙——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心的考察[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 [52]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 [53] 陈翰伯.陈翰伯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54] "Fuh Tan University Show Features Journalism." *The Shanghai Times*. 9 Oct. 1935.
- [55] "Peking University: Proposed School of Journalism with American and Chinese Professor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0 July 1923.
- [56] "Chinese School of Journalism: Visit of Pupils to Offices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31 Dec. 1926.
- [57] "Chinese College Of Journalism Planned By Shai Newsmen." *The China Press*. 8 Dec.1928.
- [58] [美]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 [59] 外国驻华记者论中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利害,英美记者施乐等致平津新闻学会函[N].大美晚报,1936-2-13.
- [60] 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61] 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62] 唐惠虎,朱英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上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 [63] 万国记者俱乐部成立[N].盛京日报,1919-02-19.
- [64] 纪京报界十五日之两盛会[N].申报,1919-02-19.
- [65] 北京报界之两呈文[N].民国日报,1919-07-04.
- [66] 新闻记者联欢会之演讲宴[N].申报,1922b-04-17.
- [67] 新闻记者联欢会开会纪[N].申报,1922c-05-15.
- [68] 记者会音乐演讲欢迎宴志[N].申报,1924-08-18.
- [69] "Chinese Journalists Are Entertained By Reuter's Agency." *The China Press*. 19 May 1921.
- [70] "To Rescue Reporter." *The China Press*. 12 Aug. 1930.
- [71] "Chinese Journalists Say Press Law Severe." *The China Press*. 17 July 1935c.
- [72] "Chinese Journalists Organize Protes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3 Jan.1936.
- [73] 邵飘萍著,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74] 王伯衡.中国之西字日报[A].载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光新书局,1930.
- [75] 黄梁梦.外人在中国经营之通讯业[A].载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C].上海:上海光新书局,1930.
- [76] 郭恩强.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77] 关于张学良奇谣感言[N].大公报,1930-08-19.
- [78] 张咏.以“真相”的名义——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报道的批判以及对新闻检查的宣传[A].载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 [79] 张季鸾著,张竟无编.张季鸾文集[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
- [80] 胡道静.上海的日报[C].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状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 [81] 时局与造谣[N].大公报,1929b-10-25.
- [82] 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M].长沙:岳麓书社,2012.
- [83] "Local News Brevities." *The China Press*. 11 July 1932.

- [84] "Editor in Court." *The North-China Daily Press*. 23 May 1925.
- [85] "Peking's Phantom Newspaper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8 July 1929.
- [86] "Chinese Journalism."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2 Dec.1928.
- [87] "Fleet Street Canton: Scen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The North-China Herald*. 23 May 1914, p.626-627.
- [88] 万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开会昨讯[N]. 晨报, 1920a-10-20.
- [89] 万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将改组[N]. 晨报, 1920b-10-21.
- [90] 龚德柏. 龚德柏回忆录(上)[M]. 台北: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89.
- [91] 冷观/胡政之. 东北之游[N]. 大公报, 1928-09-24至1928-10-14. 载王瑾, 胡政之文集(上)[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 [92] 赵效沂. 报坛沉浮四十五年[M]. 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
- [93] Abend, H. *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 London: Lowe & Brydone Printers Ltd, 1994.
- [94] 郭步陶. 造就新闻人才和办理新闻事业有彻底合作的必要[J]. 新闻学季刊, 1935(1), 第7-9页.
- [95] 彬. 关于复旦新闻学系[N]. 申报, 1930-10-19.
- [96] Snow, H. F. *My China Years: A Memoir by Helen Foster Snow*.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84.
- [97] 邓绍根. 百年回望: 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10), 第11-27页(为了贴近民国新闻文化语境, 本文引用的《新闻记者信条》采用了民国时期流传较广的汪英宾译文).
- [98] "Talk On Journalism Given Before 300 At Chinese Y. M. C. A." *The China Press*. 3 Nov. 1921b.
- [99] 胡庶华. 大学教育与新闻人才[A]. 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 1948(4). 载龙伟等编. 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00] 张咏, 李金铨. 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A]. 载李金铨主编.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101] Hamilton, J. M. "The 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 Thomas F. F. Millard, J. B. Powell, and Edgar Snow."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5 .1 (1986):27-48.
- [102]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郑明萱译. 极端的年代(1941-1991)[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 [103] 薛农山. 中国新闻纸中的国际问题与中国新闻记者的立场[J]. 报学季刊, 1934(1), 第49-51页.
- [104] 中宣部招待新闻界[N]. 申报, 1929-10-26.
- [105] 胡道静. 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M]. 上海:上海通志馆, 1935.
- [106] [美] 哈罗德·拉斯韦尔著, 张浩, 田青译, 展江校.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07] [美] 罗伯特·福特纳著, 刘利群译. 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 [108] Shu, S. C. "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 China's Central News Agency, Zhao Minheng and Reuters (1931-1945)."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10.4 (2015) :594-644
- [109] Wei, S. "Beyond the Frontline: China's Rivalry with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over the Jinan Incident, 1928." *Modern Asian Studies* 48.1 (2014):188-224.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the principle of optimiz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in terms of the protection of user's right of information choice and the right to know.

[Keywords] intelligent news; algorithmic prejudice; information rights; ethical principle

40 On the Organic Truth of News

· *YANG Bao-jun*

[Abstract] Organic truth is not a simple type of news. It is a new concept and a new vision for analyzing news production and news truth in a new media environment. Organic truth not only means the ideas of truth are changing, but also means that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subjective mode, media mode, symbolic mode, text mode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behind the real realization of news are changing. The essence of organic truth is that the news truth is the truth present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porters, and organic truth is the truth of organic interaction in different media, symbolic, and textual ways.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realization of organic reality depends on the openness of information in a society and a country, the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of professional news production depend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At the moment, although the realization of organic truth depends on the openness of information in the society and country, the transparency of professional news production, and the enthusiasm and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professional news media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us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hould assum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rebuild their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Keywords] journalism; news truth; new media environment; organic truth

53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based in China and Chinese Reporters (1912-1937)

· *LU Peng-c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China,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China and Chinese reporters cooperated closely in interviewing and writing stories, protesting press censorship, establish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organizi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But when making news, both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nd Chinese reporters we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ism and on the behalf of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which gave rise to intensive debates and conflicts about the "truth" of news and "facts" of reportage.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China and Chinese reporters vividly reflected China journalists coordinate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rofessionalism, nationalism and liberalism,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nationalism; professionalism of journalism; journalist

72 Starting from "Humanism": A Revisit of Fromm's Communication Thought

· *PAN Xiang-hui, WANG Wei-yi*

[Abstract] Fromm's humanistic communication thought emphasizes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be the center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even all life activities, and that all human creations should not take precedence over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Unlike other members of Frankfurt School, Fromm organically combined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human nature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cism of Nazi totalitarianism and capitalism, and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 of humanism on the basis of "diagnosing the causes". Fromm believes that in fascist and capitalist societies, people can only escape loneliness in an unhealthy w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thers, the world and individuals is distorted. Idol worship and mechanical convergence are typ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is disease. Only through "love", "labo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pontaneous contact between people, between people, nature and the world,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ealthy communication", can we truly overcome loneliness, anxiety and alienation, and promote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a, Fromm's thought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s still worth our cherishing. Starting from "humanism" and finally returning to "humanism", Fromm's communication thought is the greates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esent.